

January 2015

Spivak's Strategies of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for Subaltern Studies

Yihua Chen

Peiyuan Lin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



Pa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ons](#)

Recommended Citation

Chen, Yihua, and Peiyuan Lin. 2015. "Spivak's Strategies of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for Subaltern Studies."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35, (1): pp.175-180.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vol35/iss1/18>

This Research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斯皮瓦克“庶民研究”的理论建构策略

陈义华 林培源

摘要: 斯皮瓦克是庶民学派早期的核心成员之一,她在后续研究中引入臣属者视角,重修界定了庶民学派的核心概念,同时还修正了该学派早期所建构的批评方法。她的“庶民研究”并非中西学界认为的那样从属于“后殖民批评”或“女性主义批评”。斯皮瓦克的“庶民研究”为读者勾勒出了庶民经验被遮蔽的踪迹及其背后所隐藏的权力关系,进而挖掘出庶民反抗所具备的政治意义,为庶民经验进入知识生产开启了全新的可能性。

关键词: 斯皮瓦克; 庶民研究; 底层经验; 知识生产; 政治意义

作者简介: 陈义华 暨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比较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英美族裔文学。电子邮箱: cyh1207@sina.com
林培源 暨南大学比较文学专业研究生 主要研究英美族裔文学。电子邮箱: linpeiyuan23@163.com 本文为2012年度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项目“庶民学派文学批评理论探析”[项目编号: 12YJA752002]以及暨南大学“宁静致远”项目“当代文学理论研究的范式危机与转型”[项目编号: 12JNYH007]的阶段性成果。

Title: Spivak's Strategies of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for Subaltern Studies

Abstract: Spivak is a one of the core members of Subaltern Studies. She redefined the key categories and concepts of Subaltern Studies from a subaltern perspective, redefining the critical approaches of early Subaltern Studies. The paper argues that Spivak's Subaltern Studies, in a stricter sense, should not be viewed as a branch of postcolonial studies or feminist criticism. Subaltern Studies delineates the trajectory by which Subalterns' experiences are eliminated and reveals the political significance of Subalterns' resistance, which opens new possibilities for the Subalterns to enter the field of knowledge production.

Keywords: Spivak; subaltern studies; subaltern experience; knowledge production; political significance

Authors: **Chen Yihua**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the School of Liberal Arts,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2, China), with research focus on Anglo-American ethnic literature studies. Email: cyh1207@sina.com

Lin Peiyuan, Postgraduate student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2, China), specialized in Anglo-American ethnic literature studies. Email: linpeiyuan23@163.com

在西方学术界,斯皮瓦克(Gayatri C. Spivak)被视为“后殖民批评”或“女性主义批评”的代表人物,致使其“庶民研究”往往被忽略或者纳入上述两种思想体系中。斯皮瓦克对此很不以为然。在中国情况也基本类似。我们认为,斯皮瓦克的“庶民研究”不能被简单纳入上述西方主流学术思想体系中去。本文将从四个方面来还原斯皮瓦克庶民研究的基本路径与理论建构策略,帮助读者认识斯皮瓦克庶民研究的独特性。

一、核心概念设定中的臣属者视角

庶民学派^①认识到了印度社会历史的复杂性以及殖民与后殖民时期多元的权力关系,他们移用了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所用的核心范畴“Subaltern”^②来描述各类非特权群体。

但在具体研究实践中,一则,庶民学派受限于

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惯性思维,处处受制于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二则,庶民学派在批评范畴的使用上颇为混乱,存在频繁交替运用“Colonized”、“Women”、“Working Class”和“Peasantry”等批评术语的情况,这从根本上虚化了“Subaltern”这一术语的具体所指。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斯皮瓦克引入了文化研究的视角,试图帮助陷入泥沼中的庶民学派走出经济决定论的怪圈。与此同时,斯皮瓦克也竭力利用她在北美学术圈的影响力,努力推介该学派及其学术理念,逐步提升了该学派在西方主流学术界的影响力。

斯皮瓦克认真考察了印度本土社会的权力关系,对其核心术语“庶民”进行了再修正,让这一术语具有了流动性,让它随不同情景具有不同所指。这样,任何处于权力关系轴线末梢的边缘人都进入了批评视野,使得多元经验进入知识生产成为可能。

马克思主义的“剥削阶级/被剥削阶级”、后殖民批评的“殖民者/被殖民者”、女性主义理论的“男/女”等都建基于二元对立关系之上。“庶民”这个术语在重新界定之后则完全不受限于此。斯皮瓦克这样修正并非标新立异,而是因为庶民学派原有的批评范畴无法有效描述后殖民社会多元的权力关系以及印度复杂的社会结构。

在上述马克思主义批评、后殖民批评以及女性主义话语中所设定的二元对立中包含着权力等级关系,如果我们放眼印度社会的权力结构,我们会发现所谓二元结构并不存在,而其面貌更加斑驳难辨:主导地位与从属地位并不是绝对的,要视其所属的权力轴线而定。这是因为现代与前现代两条权力关系轴线并存:作为被殖民者的封建王公在印度本土社会脉络中可能又是对底层作威作福的压迫者;再比如腰缠万贯的资本家在现代经济体制下无疑是剥削者,然而其中不少人可能是凭一己之力取得成功的贱民,因此受到各种歧视。这种特殊的权力关系状况被斯皮瓦克称为“没有主导的霸权”(Harasym 127)。

斯皮瓦克把这种思考范式称为“文化决定论”。但同时,斯皮瓦克并不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也不排斥社会分析中经济元素的介入(Morton 25)。斯皮瓦克认为独崇阶级与阶级斗争的分析范式最终必然会忽略其他形式的压迫,比如基于性别、种族与种姓等维度的压迫。这

里斯皮瓦克就面临着在研究实践中如何定位经济因素的问题。斯皮瓦克提出将“经济”置于删节号之下:取消其决定性的同时又让其具有能见度(Harasym 91)。斯皮瓦克对于庶民学派核心概念的重新阐释使研究者能够参照具体语境来临时赋予其所指,进而描述不同边缘群体的经验。

在《农民起义的主要问题》一书中,该学派的创始成员古哈用“庶民意识”来审视后殖民社会底层、妇女以及低种姓群体的思维与行为方式。斯皮瓦克指出,这个批评范畴与马克思主义批评的“阶级意识”并无本质区别,二者都力图赋予各类群体抗争经验一种并不存在的合一性。在这种批评范式中,所谓自主性或主体性,实际上是精英话语建构的后果,根本不触及这些群体的现实挑战与苦难,也根本无法为他们赋权,争取其政治与经济权利,满足其利益诉求(MacCabe 91-134)。非特权群体的差异性是一个客观存在,即便女性也有着种族、阶级、种姓等方方面面的差异,自然有着截然不同的利益诉求。

斯皮瓦克建议用“庶民性”(Subalternity)这个术语来取代“庶民意识”,因为这个概念来自于庶民文化秩序内部,能够呈现差异化的庶民群体内部的思考逻辑脉络。这个新的概念让研究者能够按照特定群体的文化逻辑来思考他们的处境(Spivak “Subaltern Studies” 103)。与所谓阶级意识不同的是,“庶民性”的所指是流动的,是一个在临时性语境中暂时搭建起来的思维框架。斯皮瓦克将其称为“策略性本质主义”(Spivak “Subaltern Studies” 132)。虽然斯皮瓦克没有阐释何谓“策略性本质主义”,但她在分析范畴定义中引入“臣属者”视角却给庶民学派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

二、再现庶民碎片化的经验与现实困境

斯皮瓦克为我们勾勒出了后殖民本土社会非特权群体所面临的困境,挑战了当代自由派学者充满玫瑰色的幻象。在研究实践中,她也勾画出了庶民经验被遮蔽的踪迹,为将庶民历史与当下的经验纳入知识生产提供了路径。我们认为,这是斯皮瓦克在人文社科领域的另一个巨大贡献。现代西方自由主义者对于所谓“庶民”的出路似乎很乐观,因为他们认为,庶民可以通过现代国家

的代议制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从而摆脱自己的属下地位。斯皮瓦克对此颇不以为然。在《庶民可以说话吗?》一文中,斯皮瓦克提出,以代议制为标志的政治代表权,在多数情况之下,并不能够保证庶民的利益必定得到认可与保障,也不一定能保证他们的声音能够被外界听到(Spivak “Can the Subalterns Speak?” 197)。

德勒兹与福柯曾经这样假设:在本质上,美学(戏剧、舞蹈与电影脚本)的再现与现代民主制度下所谓代议制的政治代表权都或直接或间接地呈现了某种意识形态。它们在组织结构形式与运行机理上具有某种程度的相似性。斯皮瓦克指出,虽然“艺术再现”与“政治代表权”在西语表达中相同——都是“Representation”或者是其同根词,然而它们之间的差异性十分明显:艺术品再现特定庶民群体的生活经验的时候,它会调动各种艺术元素,差别化地呈现庶民的经验、他们的困境、挑战以及多元的利益诉求。虽然这种表述不符合后现代主义的文艺观,因为后现代主义的文艺观并不承认所谓的“真实”,但显然“庶民”内部的差异性是可以得到凸现的;然而,代议制民主制度下的代表机制只允许一个调和起来的声音来代表边缘群体表达诉求。在这种情况下,“庶民”群体内在的差异性及其多元诉求表达就被遮蔽了(Spivak “Can the Subalterns Speak?” 199-201)。印度后殖民社会高度分裂,基于族裔、信仰、地域等前现代身份归属与阶级等现代身份归属的错综复杂,难于形塑统一的身份认同,也无法协调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自然也就没有办法形成一体化的政治力量,在此情况下必须将代表权让渡出去。

斯皮瓦克在有关《路易波拉巴的雾月》的书评中,清晰阐释了有关政治代表权的观点。马克思在这一作品中向我们呈现了十九世纪法国小土地所有者的斗争历程以及其对于这一历史的看法:在那个年代,小土地所有者的经济状况以及社会生活现实让他们无法获取清晰的阶级意识。因此在现代民族国家的代议制体系中,小土地所有者没有直接进入这些机构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的可能性,而是必须象征性地由富农以及地主等作为代理人或者由资产阶级政党来代替他们发言,表达他们的利益诉求。有鉴于此,斯皮瓦克指出,现代政治机构没有办法给庶民提供表达其利益期待的平台。可见,代议制民主机制并没有实现差异化群体的有效赋权,提高他们的社会能见度,反

而是遮蔽了差异性,消除了庶民多元的声音。

现代代议制政治体制遮蔽庶民多元声音的机理实际上与西方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者所竭力倡导的“全球姐妹情谊”有着共通性。斯皮瓦克指出,西方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者标榜自己主张的普适性,试图代表所有妇女表达他们共同的诉求。然而,斯皮瓦克指出,所谓平等联盟——发达国家的妇女精英与发展中国家妇女之间的联合——实际上根本就不具备实现的现实可能性(Harasym 107)。斯皮瓦克是说,西方妇女精英一直竭力用西方女性主义理论来解读发展中国家妇女的经验,表达她们的利益诉求;在多数情况下,发展中国家的妇女精英也会照搬西方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者的相关理论来解读他们当下的处境与挑战。斯皮瓦克指出,西方女性主义理论与发展中国家妇女的现实经验存在着时空错位与根本性错位,毕竟,来自不同语境下的妇女有着迥异的历史与现实经验,面对不同挑战,当然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

斯皮瓦克的研究为我们戳破了当代东西方社会的自由主义精英知识分子所编造的一个谎言:他们能够为边缘人群代言,为庶民发声,表达他们的政治与经济利益诉求。斯皮瓦克的研究告诉我们,让庶民差异化的经验进入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生产,是让庶民的声音能够被听到的前提条件。斯皮瓦克所谓的庶民经验包括了庶民的日常生活经验,也包含了庶民的历史记忆。把庶民的经验放入到立体多元的维度中,我们才能够有效地去体会,去考察,去把握不同背景的庶民群体的多元经验。只有这样,才能够构建知识生产的合法性,也才能尽可能本真地呈现庶民的声音。

斯皮瓦克深刻认识到了庶民经验在印度殖民历史以及后殖民历史写作中的缺席,进而努力追踪印度本土“庶民”,特别是妇女在英国殖民当局以及后殖民民族国家档案中逐渐消失的踪迹。她把文学研究中后现代叙事学研究方法与档案细读贯通起来。在《色目尔人的王妃》这篇学术论文中,斯皮瓦克就充分实践了自己的学术理念,为我们勾画了妇女的声音被擦除的轨迹。

斯皮瓦克经过研究后发现,在第一次印度独立战争之后,东印度公司退居幕后,大英帝国当局直接确立统治的过程中,印度土王宫廷的贵妇开始屡屡出现在殖民档案中,但后来却逐渐销声匿迹了。那么,其中的蹊跷在哪里呢?斯皮瓦克大量研究了当时的殖民档案后指出,高种姓妇女在

殖民历史档案中命运的变化服务于东印度公司所追求的经济利益,也服务于大英帝国接管政治权力的需要(Spivak “The Rani of Sirmur” 263)。色目尔王国靠近尼泊尔,处于土著印度^③控制下。色目尔王国有着十分重要的战略位置,同时也是商业走廊,它是殖民当局重要的经济与贸易路线,也是英国统治者对付尼泊尔起义军的要塞。大英帝国力图将色目尔王国纳入自己的统治范围,以服务于自己的经济与军事需要。

为了控制色目尔王国,殖民当局“废黜了拒绝同英国人合作的色目尔国王伽玛(Karma Prakash),理由是他过于野蛮放纵,恣意杀戮臣民,沉湎声色,不理朝政”(Spivak “The Rani of Sirmur” 265)。在驱逐伽玛之后,“王后被确立为她的儿子——未成年国王法特(Fatteh Prakash)的摄政”,因为英国殖民当局无法信任色目尔王国王室里的其他成员,而“女人显然更容易被操纵控制”(Spivak “The Rani of Sirmur” 265)。斯皮瓦克认为“王后被推上权力的巅峰是因为她是前任国王的妻子而且是一个更好操控的工具”(Spivak “The Rani of Sirmur” 265)。

在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场景中,我们应该把王后的特权地位与王后的性别身份综合起来加以考察。斯皮瓦克指出,显然殖民当局首先看中的是王后的性别身份,他们相信王后作为一个女性无力反抗殖民当局各种暴力。当殖民当局站稳脚跟,觉得无须利用王后的权威来建构殖民统治合法性的时候,王后也就退出了历史舞台,他们就把她从殖民档案中踢出去了。斯皮瓦克认为“只有在帝国主义扩张需要她的时候,王后才出现”(Spivak “The Rani of Sirmur” 270)。殖民当局的历史如此,后殖民印度的所谓国家叙事对于妇女的书写也如出一辙。关于妇女在所谓民族解放斗争中角色的叙事也一样服务于后殖民国家政权合法性的建构需求。斯皮瓦克在殖民以及后殖民的档案研究中,利用文化研究的跨学科研究范式,追踪妇女历史经验的碎片,重新建构妇女在反抗殖民,建立民族国家斗争中的历史经验。斯皮瓦克的这种研究范式为后来的庶民研究提供了样本。

三、揭示庶民经验被 遮蔽背后的权力

在庶民研究中,斯皮瓦克一方面勾勒了庶民

的历史与现实经验被擦除的痕迹;另一方面,她为读者指明了这种遮蔽行为背后所隐藏的意识形态与权力运作及其造成的后果。她通过重新阅读印度教典籍以及殖民与后殖民档案,深入分析了本土妇女的利益诉求及其经验遭到改写甚至被擦除的痕迹。在分析中,斯皮瓦克以印度寡妇自焚殉夫的行为作为切入口。她指出,印度的宗教经典文献如《摩奴法典》(约成书于公元前7-2世纪)与《梨俱吠陀》(约成书于前900年)中,寡妇在火堆上以身殉夫被解读成高贵的具有宗教意味的自我牺牲行为,不能简单地等同于“自杀”。

印度传统宗教,从婆罗门教到印度教,都强烈反对放弃自我生命,除非它升华为宗教意义上的自我牺牲。但吊诡的是,宗教典籍又规定男人不能享有这种崇高的特权。在这样一种状况之下,“例外”就构建了一种父权制的统治架构。斯皮瓦克表明“妇女毁灭自我同时又能够去除自杀恶名的唯一场所就是她死去丈夫的火化柴堆上”(Spivak “Can the Subalterns Speak?” 200)。她同时也指出,在践行“萨提”时,妇女被界定为其逝去丈夫遗留下来的私有财产,就如同其丈夫生前的用具一样,须得彻底烧掉。宗教圣典在这个过程中赋予了自焚行为自我牺牲精神的崇高性(Spivak “Can the Subalterns Speak?” 301),成为“好妻子”恪守为妻之道,弘扬妇女美德的特异能指。

然而,这一行为的所指意义在异质文化间传播过程中发生了变异:殖民当局以及西方自由主义学者显然有着截然相反的看法,在他们眼里,“萨提”就是印度残忍野蛮落后的一个能指或标志。在这样的思维框架之下,西方人的殖民掠夺行为就被合法化为传播文明的光荣使命:埋葬印度本土社会野蛮黑暗的父权制文化,拯救印度妇女于水火之中。在深入分析了汤姆逊(Edward Thompson, 1886年-1946年)于1927年发表的论文中有关“萨提”的论述之后,斯皮瓦克揭开了西方有关“萨提”论述背后所隐藏的殖民主义意识形态:殖民统治者以“萨提”为所谓证据,展开对印度传统文化的全面污名化,其意图昭然若揭,那就是试图将殖民暴行扭曲成“解放”与“拯救”的光荣使命,目的是为建构殖民统治的合法性张目(Spivak “Can the Subalterns Speak?” 205)。

在这里,斯皮瓦克非常敏锐地注意到,西方殖民者与印度民族主义者在寡妇自焚问题上的论战,实际上并没有赋予女性表达自我意愿与利益

诉求的空间。他们实际上只是在利用女性的身体为其建构各自政治主导权的合法性,与妇女解放无关。斯皮瓦克所谓“庶民没有可以说话的空间”正是这个意思(Spivak “Can the Subalterns Speak?” 207) 因为她注意到女性的主体性完全被埋葬在民族主义者所谓道德规范以及西方所谓“野蛮文化受害者”的殖民话语中。

在有关“萨提”问题的进一步讨论中,斯皮瓦克对有关巴都丽(Bhubaneswari Bhaduri)的国家历史档案进行了叙事学分析。据国家档案记载,1926年巴都丽在加尔各答北部的一间寓所里自杀。独立以来,历史研究者都在努力追寻巴都丽的真实身份及其自杀背后的真实动机。经过研究,学者们最终在这一问题上达成了一致:巴都丽的真实身份是印度本土反殖民游击队员,她选择自杀是因为民族主义者所宣扬的暴力同自己的宗教信仰冲突。

斯皮瓦克在这里以叠加文本来描述这一过程:长期以来,巴都丽参与民族独立解放的经验被另一种父权制叙事所擦除。在父权制叙事文本中,她反殖民的勇敢作为及其和平主义的理念都被遮蔽了,而她在忏悔中的自杀行为再次被编码,谓之“非法之爱”过后的畏罪自绝——“萨提”的另外一种版本——并让她的家族在后世若干代都蒙受羞辱(Spivak “Writing” 307)。斯皮瓦克指出,巴都丽作为印度本土社会的底层妇女,其在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中的贡献被父权制的民族解放叙事所遮蔽了(Spivak “Writing” 308)。通过逆向阅读,斯皮瓦克为读者描绘出底层妇女的经验消失的痕迹及其隐藏的权力关系。

斯皮瓦克的庶民研究同“后殖民批评”或者“女性主义批评”有着显著区别。后二者所聚焦的分别是前殖民地被征服的人民以及妇女的现实经验和造成这种受压迫现状背后的文化体系,进而揭示并消解这种压迫体制的话语逻辑。斯皮瓦克批评该分析范式的精英主义姿态。她提出,要重构包含底层经验在内的知识生产范式,研究者必须留意到官方历史的裂隙与矛盾,在裂隙与矛盾中对庶民经验的碎片进行整理并重构他们的历史。可见,她不是直接去解构所谓殖民话语的合法性,而是去关注庶民的经验并努力将庶民的经验纳入知识生产,从而真正为庶民赋权。虽然其目标实现的可信度让人存疑,但其研究范式为我们思考庶民的经验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四、庶民的抵抗及其政治意义

在研究过程中,斯皮瓦克揭示了庶民阶层独特的抗争形式及其所彰显的政治意义,其所谓“庶民不能说话”的论断则为我们揭开了庶民经验被遮蔽的事实,但她也不否认庶民政治的能量。斯皮瓦克有关“庶民不能说话”的论述让不少学者怀疑其理论模式的有效性。著名学者帕里(Benita Parry)就指出,斯皮瓦克的论述揭示了庶民在历史与现实压迫面前的无力感,从而否定了庶民的能动性,遮蔽了庶民的政治与经济利益诉求。帕里指出“斯皮瓦克的论断断绝了庶民的历史经验进入知识生产的可能性”(Parry 39)。

这样的疑虑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斯皮瓦克的论述总是被抽离其具体语境,进而被认为她不承认庶民具有强大的政治行动力。如果回到斯皮瓦克相关论述的上下文中,我们会发现这样理解斯皮瓦克的论述是一种严重的误读。在一次学术访谈中,斯皮瓦克指出“庶民不能够说话意味着即便是庶民拼命讲话的时候,他们的声音也不能够被听到”(Spivak “Can the Subalterns Speak?” 212)。可见斯皮瓦克的意思并不是说庶民无法表达自我经验与利益诉求,因此没有办法进入知识生产中去,而是认为庶民的声音被精英话语所遮蔽或扭曲,不得被迫接受自己在政治与经济活动中的从属地位。

斯皮瓦克对于庶民的抗拒形式及其政治意义的解读独辟蹊径。在德维的孟加拉文作品《黑公主》的英语版译序中,斯皮瓦克揭示了底层的抗拒及其所表现出的政治能量。20世纪60年代后期,西孟加拉邦北部山区的农民不堪盘剥,揭竿起义。斯皮瓦克在译序中特别突出了这样的场景:一位自称“黑公主”的起义军女战士被捕并受到正规军的刑讯逼供,但是她拒绝透露任何与起义相关的情报。

故事开始的叙事者是正规军长官色纳那亚克。尽管他努力阅读游击队的宣传品,竭尽全力解读农民军的利益诉求,但是他没有从中找到任何有价值的信息。色纳那亚克翻来覆去,在小册子里也只找到神话或民间故事的一些断片。所有的印度人对这些古老的神话传说都耳熟能详,他根本就没有办法在里面找到任何政治意涵。斯皮瓦克指出,政府军首长的精英位置就决定了无法理解对方,因为这些农民的思维还停留在远古

的年代,有着与政府军首长完全不同的思考方式(Spivak “Writing” 387)。农民游击队员的宣传手册看似与政治完全无关,却是农民起义军拒绝使用精英话语来表达其政治诉求的表征,这种行为本身就是一种有意义的抵抗手段。

故事中女主人公“黑公主”的行为似乎令人不解。在审问中她不是使用印地语,而是说着无人听得懂的部落方言。在表面的问答中,色纳那亚克根本就没有办法了解“黑公主”参加游击队的过程以及她想要表达的诉求,也无从知道她哼唱的曲子的具体内容。在审判中,“黑公主”选择部落语言本身也可以被看作是一种主动抗拒。斯皮瓦克在此指出,小说与史诗《摩珂婆罗多》在效果上构成互文,凸显了农民游击队员“黑公主”的抗拒力(Spivak “Writing” 394)。

在印度史诗中,般度家族的五个儿子娶了同名主人公“黑公主”。在史诗中这个情节耐人寻味。“黑公主”的其中一个丈夫在以妻子为赌注的赌博中失利了,对方张牙舞爪来剥她的沙丽。这个时候,克里希纳显灵,出手干预,“黑公主”得以保全自身。克里希纳之所以显露神迹,是因为黑公主奉行了“法”,也就是遵行了“好妻子”的本分。《摩珂婆罗多》将妇道与神迹联系起来,实际上是父权制凭着在印度享有崇高地位的文学典籍将所谓的“妇道”神圣化。德维的小说在这里戏仿了《摩珂婆罗多》中的情节:由于色纳那亚克的教唆,政府军士兵强奸了“黑公主”。但是“黑公主”并未得到神的庇佑。她拒绝在这群男人面前穿上衣服,一直赤身裸体。“黑公主”蔑视性侵犯,她展示自己饱受蹂躏践踏的血肉之躯可以看作是她对于所谓自由民主为核心的现代国家叙事的强烈控诉。

斯皮瓦克指出,“黑公主”虽然受尽屈辱,但她以自己的方式进行着反抗:拒绝穿上衣服。“黑公主”当众展示自己受虐的身体实际上是对现代国家叙事的挑战。“‘黑公主’用自己布满伤痕的乳房去冲撞政府军军官。第一次,色纳那亚克站在手无寸铁的妇女面前害怕了”(Spivak “Writing” 392)。“黑公主”挑衅地质问“这些衣服有什么用?你可以剥光我的衣服,但是我倒要看看你如何能再给我穿上?你是个男人?”(Spivak “Writing” 396)。斯皮瓦克指出,“黑公主”的质问有力地扭转了二者之间的主客体关系,也颠覆了审判双方的位置。

斯皮瓦克指出,表面看来,庶民群体政治诉求表达方式,好像对民族国家的现代政治进程没有直接影响力,但是这并非说他们的抗拒就毫无意义。迫于大众暴力反抗的压力,无论殖民当局还是民族国家的统治精英,都会在政治领域进行缓慢但持续有效的改良,这本身就彰显了庶民的抗拒所具有的巨大政治力量(Spivak “Writing” 402)。她还指出,庶民研究必须努力寻找以下问题的答案:“庶民”的经验是如何被整合到精英历史叙事中去的?研究者应该如何阅读精英主义历史书写中的庶民经验?庶民经验的碎片整合起来的历史叙事以怎样的方式挑战了主流历史书写?

注释[Notes]

- ① 庶民学派(Subaltern Studies School,在国内又被译为庶民研究学派、贱民学派)是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兴起于印度,后来风行欧美学术界的一个思想流派。该学派主张颠覆现有的知识生产范式,将底层的经验纳入到知识生产中去。
- ② 庶民学派的核心批评范畴“Subaltern”是一个流动的概念,指各种权力关系轴线末梢的群体,无中文对应翻译,2005年之后逐渐固定为“庶民”这一译名。
- ③ 在英国殖民印度历史上,被殖民当局掌控的地区谓之英属印度;土王所控制的王国被称为土著印度。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 Harasym, Sarah. *The Postcolonial Critic: Interview, Strategies, Dialogues*. London: Routledge, 1990.
- MacCabe, Colin, ed. *In Other Worlds: Essays in Cultural Politics*. New York: Methuen, 1987.
- Morton, Stephen.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London: Routledge, 2003.
- Parry, B. “Problems in Current Theory of Colonial Discourse.” *Oxford Literary Review* 4(1987): 27-58.
- Spivak, G. C. “Can the Subalterns Speak?” *Marxism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 Eds. Cary Nelson and Larry Crossberg. Normal IL: Illinois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8. 189-214.
- . “Subaltern Studies: Deconstructing Historiography.” *Subaltern Studies* 4(1985): 101-397.
- . “The Rani of Sirmur.” *History and Theory* 3(1985): 247-72.
- . “Writing Sexual Difference.” *Critical Inquiry* 8(1981): 381-402.

(责任编辑:王嘉军)